

中国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的再思考

张 宁 武 沐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兰州 730020)

摘 要: 自艾滋病在中国传播开来后, 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未能幸免, 且进入21世纪以来, 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部分流动的少数民族群体中艾滋病呈快速传播趋势。众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及有关项目支持和公共卫生部门邀请下, 对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地区的艾滋病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 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新的发现和防治对策, 同时也启发并促进少数民族艾滋病问题的更深入研究。在梳理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中国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 中国; 少数民族; 艾滋病; 问题; 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1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11) 04-0037-07

Chinese Minority Related AIDS Problem Study and Think

ZHANG Ning WU Mu

(Institute of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AIDS since spread in China, the ethnic minorities live in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also failed to escape by luck, and 21st century part where ethnic minorities live in concentrated communities and some flow of minority groups in a rapid spread of AIDS trend. Ma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in relevant project support and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of minority and invited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he AIDS problem immediately multi-level and persp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has many new discoverie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but also to inspire and promote the minority AIDS problem more in-depth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e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mb based on Chinese minority related to HIV/AIDS problem research provides our thinking.

Keywords: China, Chinese minority, AIDS, problem, thinking

一、引言

在卫生部公布的中国艾滋病流行高发地区中, 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 云南、新疆、广西、四川等省区) 艾滋病传播情况严重, 对当地人口生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构成巨大挑战。^[1] 近年来, 学界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回应, 研究成果丰富。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艾病防治现状,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 其中, 比较典型的应用研究案例包括: 庄孔韶先生及其团队对小凉山地区彝族家支防治毒品/艾滋病的研究和对海南、广西、四川等地部分少数民族女性工作者流动组织在防治艾滋病的作用研究; 翁乃群先生对云南艾滋病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分析; 崔延虎先生对新疆民族社区调查中发现, 社区内的人际交往、亲属关系以及特定民族所具有的亚文化特征与艾滋病传播有密切联系; 张海洋先生和侯远高先生针对凉山州彝族毒品、艾滋病流行现状, 创建本土社会组织 (NGO) 参与防治行动, 使得防治目标更趋社会实际效果。一些研究工作者对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回顾与总结,^[2] 为社会科学在防治艾滋病领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笔者认为, 对以往

收稿日期: 2011-05-25

[作者] 张 宁 (1982-), 男, 江苏溧阳人,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民族社会学; 武沐 (1958-), 男, 北京市人, 法学博士,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民族学。

研究再进行系统、细致的回顾和归纳还有空间,从梳理中可以发现少数民族相关防治艾滋病问题的一些新思路和学科建议。

本文在梳理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毒品传播与艾滋病、性传播与艾滋病、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艾滋病传播带来相关社会问题等四个方面的研究,对十年来学界在此方面的学术努力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一些思考,以供大家参考指教。

二、中国少数民族与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回顾

根据十年来学界研究成果现状,中国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主要围绕毒品传播、性传播、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传播带来相关社会问题等四个方面。研究按着艾滋病传播的原因、防治的对策和引发的社会问题这样一个逻辑规律展开探讨。研究成果都注重实地的田野调查,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一时期研究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的突出特点。下面笔者对学界的研究个案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归纳。

(一) 毒品传播与艾滋病

毒品传播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径之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感染人数众多,因其采用静脉注射方式以获得最大的享受而流行于吸毒者中。一些静注吸毒者又以共用针头为吸毒的主要方式,从而将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传播到一个又一个吸毒同伴中。另一个特点是地域性明显,毒品流行重灾区几乎都是在“金三角”和“金新月”两大国际毒品走私通道所辐射的区域,比如:云南、广西、四川、贵州、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区。学界对少数民族地区毒品和少数民族吸毒人群的观察和研究大部分也是在以上省区展开的,由于研究对象的敏感性、潜伏性等特征,绝大部分研究都选取戒毒所、看守所、监狱等的吸、戒毒人员为调查对象来进行观察的,这样调查得出的样本量、调查所需时间周期和调查者的个人安全都有基本保证,被研究者们广泛采取。在理论分析框架上侧重社会文化分析和批判医学人类学视角,关注社会不平等、毒品传播和感染艾滋病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等特点。

李冬莉的博士学位论文^[1]对甘肃省公安系统的4个戒毒所(兰州榆中、平凉,临夏广河、庆阳)进行的15个重点组讨论调查记录以及在深入访谈和直接观察笔记的基础上,探讨吸毒群体与艾滋病有关的高危行为和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认为,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艾滋病现象集中地反映出中国在转型时期中社会的许多特点。在甘肃戒毒所的被调查吸毒群体中,如同在其他一些国内外的被研究地区,决定个人行为危险与否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层面上。贫困人口因受教育少、理解不了预防信息而缺乏艾滋病认知;少数民族人口不仅因为贫困、受教育少,还因为民族文化隔阂,总体上较汉族更加缺乏艾滋病认知;这些人口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方法,处于易感状态;吸毒女性易受HIV侵袭的原因要更加深刻和复杂:除了受贫困、教育程度低下影响而对艾滋病的认知欠缺,更有社会歧视方面的原因。作者提出的对策建议认为:1. 应从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层面对预防宣传作出战略调整。在资金和专业力量投入、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上,更加侧重被监禁群体、吸毒群体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对其中少数民族和女性性工作者给予特殊重视。2. 放弃以一代全,忽略效果的宣传模式。应调动各地区、各级领导和普通群众的积极性,包括调动各类高危群体的积极性,不断探索形式多样的、通俗易懂的、本土化的、能够有效预防和改变特定危险群体中的特定危险行为的宣传教育方式和宣传品。3. 反对歧视。须大张旗鼓反对所有与艾滋病有关的社会歧视(包括反对对艾滋病人、对病毒携带者、对吸毒者、对性工作者、对同性恋者、对艾滋病人家属和孤儿的歧视)。4. 如同对付非典型肺炎,艾滋病预防必须最大限度动员群众。为此,政府和媒体应积极促进社会的艾滋病意识,信息透明,讨论公开。

孙咏莉博士学位论文^[2]田野调查点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伊宁市(全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和感染率最高的城市之一,通过静脉吸毒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占总报告人数的95%,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率高达85%以上),调查选取城乡结合部的维吾尔族聚居社区为基点,通过对萨阿代特社区、针具交换站、伊宁市人民医院和戒毒所等吸毒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多个生活场景的参

与观察以及对这一群体的深度访谈，试图展现出这一群体特有文化的真实面貌。作者认为，这一群体内部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特征，此外，还描述这一群体是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包括他们与家庭、邻居、同伴、防疫部门、公安部门等的关系。论文的一些特色之处包括：对萨阿代特社区居民对身体、体液的看法和毒品、艾滋病的地方性知识，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身体和体液的，他们又是如何解释毒品和艾滋病的；同时运用“贫困文化论”来解释萨阿代特社区沦为毒品、艾滋病肆虐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的贫困文化；考量这一群体亚文化内部的同质性与差异性，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还他们话语权，纠正目前国内外研究将其文化单一化和平面化的描述。他们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同样拥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并以此作为衡量圈内人/圈外人的标准；关注这一群体在不同场景之下，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等。

翁乃群先生在云南HD州对景颇族村落调查也证明了海洛因的流动对艾滋病在村落传播的影响^[3]，作者认为，艾滋病或性病的传播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它是与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艾滋病的蔓延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制度不相协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晓丽研究员^[4]在乌鲁木齐市对贩毒人群和吸毒人群定量调查的基础上，认为乌鲁木齐(包括新疆)不是制毒的基地，而是“金新月”毒贩选定贩运毒品的重要通道；不是贩毒、吸毒、艾滋病，没有民族界限；贩毒—吸毒与艾滋病是同一链条上的两害，是当地艾滋病疫情的主要成因。侯远高、丁娥编著的《发展的代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伤害与艾滋病问题调研文集》^[5]收录了作者们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新疆乌鲁木齐市、伊宁市，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广西、贵州、湖南等部分民族地区关于毒品和艾滋病传播调查的论文、报告，运用社会文化分析法对上述地区毒品流行和感染艾滋病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

(二) 性传播与艾滋病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流动少数民族群体感染艾滋病的另一途径就是通过性传播，包括商业性交易、男男同性接触和吸食毒品后的乱性等。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带有极大的社会道德背景和社会污名印象，为社会学界研究此类问题在研究方法、方式、研究对象和研究地点选取上带来了许多限制和研究本身以外需要额外考虑的诸多因素。以目前学界已进行的研究现状分析，研究主要关注一些艾滋病流行严重和从事商业性交易比较活跃的地区和典型群体。有学者及其团队关注四川、广西、海南等地“小姐”群体的流动特征以及背后反映出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学者深入四川少数民族聚居社区，长时间、大范围、多角度观察女性性服务者的内部结构和工作特点。研究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文化敏感性”、“作为组织的文化特征”等社会文化整体论理论视野下，采用主位与客位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观察和体会“他者”的世界，突出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角色。此外，还有研究工作者开始对少数民族男男同性接触者进行研究，这使得认识性传播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和内容越来越丰富。

庄孔韶先生在此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工作及研究成果不仅为社会学界参与公共卫生领域工作开拓了方向，也为人类学应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庄先生提出“作为文化的组织特征”这一中层理论概念，对研究从事商业性交易群体——“小姐”流动的特点和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起到了很好的解读，庄先生的研究充分体现出了学术理论的常青和学术实践的宽广的研究境界与大家风范。庄先生认为“关于性服务者(合法化国度通称性工作者)的问题，只有参与了她们的流动过程调研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研究与应用的框架，只待在大学校园研读学理然后加以推理是不够的。”^[6]李飞博士与庄先生^[7]在海南调查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S族群”族群文化与汉族的差异，认为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教育时要根据族群文化针对性进行防治工作。研究发现，S族群则是沿袭传统风习的同辈青年姐妹组合(同侪团体)作为组织的核心，与汉族“类家族主义”存在差别，干预工作要注重对“姐妹组合”文化的理解和以此为切入点。

兰林友教授提倡艾滋病研究和干预实践中运用“文化敏感性”策略，其田野调查点——西南P市T社区常年暂住流动人口有3000多人(其中，凉山彝族有1000多人)，住户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族群多元(该

片区的彝族分黑彝、白彝、红彝，还有一些贵州苗族小姐、云南白族小姐、纳西族小姐)。针对T社区现状，作者认为无论是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取的干预措施，还是地方基层民间组织的干预活动，都对地方族群文化缺乏敏感性。然而，文化敏感性对于项目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基于文化特性基础上的项目，无疑更具有针对性。从文化人类学以小见大的研究策略来看，往往从一个细小的行为，就能洞察某些文化特性。

高一飞博士学位论文^[8]以滇西一条修建的高速公路所经过的三个村寨——龙村、芒村、马村为民族志调查点，探讨流动人口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作者通过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关注筑路工地人群、性服务者和工地周边社区，在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深入分析各个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全面展现公路沿途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关系。作者研究主要发现，与滇西高速公路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主要引发了两类艾滋病风险。第一类是显性的工地人群与商业性行为有关的性传播风险；第二类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隐性风险——工地人群与周边村落艾滋病风险的传递与叠加。滇西高速公路途经广大的经济发展不均、社会文化特征多元的滇西农村地区，通过对公路沿途的龙村、芒村和马村三个村落的调查，发现工地流动人口与周边艾滋病风险的多重关系。在高速公路修建之前，由于区位、社会文化和生计结构的不同，这三个村落已经各自具有独特的艾滋病性传播风险与疫情。贫困农业村龙村的疫情与风险主要与村民前往德宏等艾滋病高流行区的打工传统以及村里特殊的跨境婚姻——“缅婆”现象有关；农业发达的傣族世居村芒村的风险与疫情和当地“汉傣”文化中开放的婚前/外性行为有关；靠近城区的马村的风险与疫情受其高度发展的多元非农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周边环境影响，主要与有序劳务输出有关。高速公路开工以后，三个村寨都与工地人群和新增性服务者产生了各具特点的互动。一方面，工地人员与村民的互动延续和加剧了村寨中原有的艾滋病风险；另一方面，工地人群、新增性工作者、周边村寨村民通过相互之间多种形式的多性伴行为被连接到同一个性的社会网络中，他们的风险也因此传递、叠加，再生产出新的风险。作者认为，与其说是人口流动导致了各种艾滋病风险，不如说是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贫困、不平等权力、社会发展不平衡、特殊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了不同形式的艾滋病风险，而人口流动并不是推动艾滋病传播的根本动因所在。

卡马力提·库尔曼汗硕士学位论文^[9]关注新疆乌鲁木齐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男男同性恋群体，调查点包括同志酒吧（西大桥下的一家叫“部落踏青”，公园北街路的酒吧文化一条街上的“第五大道”、“红河谷”、“堂会”、“六便士”），同志浴室（黄河路的“国盛洗浴”、位于红十月附近的“天天洗浴”及红山公园旁的“大班洗浴”），公园（红山公园、延安路公园），男子私人会所（红山附近的“君尚男子私人会所”，另一个是位于红十月附近的“君子男子私人会所”）四种类型场所。研究得出，“同志”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是一种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宽容和理解。他们背负着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很多“同志”产生严重的厌世、自闭情绪，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关怀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作为这个群体中的少数人群，受到来自这些民族社会、宗教文化方面的制约，他们的世界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随着新疆“同志”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志”参与到争取“同志”合法权益的队伍中，行使作为一个“同志”，同时作为一个合法的社会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新疆的“同志”文化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同志”的参与，作为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区，各个民族“同志”之间的交往具有多样性，同时又具有本民族的特性。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了新疆“同志”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地域性。因此影响新疆“同志”之间的交往因素不仅包含对彼此的个人选择和喜好，还包含对本民族“同志”的认同，是一个生理和文化上的双重选择过程。

（三）社会组织（NGOS）参与艾滋病防治

通过毒品和性的途径，艾滋病得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传播，各方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在国家领导抗艾资源的主流模式下，社会组织（NGOs）开始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行动中来。学者们以其学科敏锐性迅速将各类型社会组织的防艾实践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中，比如庄孔韶先生根据其学生杨洪林的介绍，深入云南小凉山地区研究当地彝族“家支”传统民间组织戒毒防艾

的作用。研究分析框架以地方性知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理论视角为主，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保护本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仍能发挥出民族传统智慧，应在少数民族防艾策略中引起高度重视。

庄孔韶先生对彝族“家支”组织参与禁毒防艾的研究成果，是国内首次探讨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在禁毒防艾领域发挥功能作用。作者研究认为，当凉山彝族面临族群危机时，彝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与道德准则，都在起作用，所以，几近封存了的古老民俗方法才能被激活，用来解决当代的社会问题。“虎日”模式在寻找传毒吸毒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民间自救的有效方法的同时，以人类学的理论为项目切入点，以一种家族仪式为契机，调动和激活了凉山彝人来自家族组织信仰仪式伦理道德、习惯法和民俗教育等层面的文化资本诸要素，进一步激发出战胜人类生物成瘾性的坚强毅力，有效地提高彝族人民的戒毒成功率，应对“世纪瘟疫”艾滋病的作用。

李光勇博士的论文对四川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对象——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是由北京、成都、凉山以及海外关心彝族发展事业的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中心总部设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并在受贫困、毒品和艾滋病影响最为严重的布拖县、昭觉县和美姑县设有工作站。研究以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发现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对提升凉山彝族艾滋病患者社会资本存量具有六个方面的作用：构建关系网络，增强社区归属感，培育信任，扩大公共参与，建立互助组织，重建社区规范。

傅果生硕士学位论文^[10]的调查在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一个景颇族村寨——帮养村展开，研究认为，景颇族放弃社区之神而进入市场。场域中的结构安排和不利位置使其遭受贫困、毒品和疾病格外严重的(disproportionately)伤害，背负着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污名。毒品和艾滋病无法掩盖景颇族当前困境的本质。毒品和艾滋病是景颇族传统文化再生产遭到破坏、社会成员和文化失调的后果。现代性话语对传统权威和原始信仰的否定、对民族权威力量的削弱使景颇族丧失凝聚力，如一盘哭泣的散沙。基于地方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体系和仪式生活能赋予社区群体生命力，并使其在社会危机中产生自我保护和主动调适的能力。

(四) 艾滋病传播带来相关社会问题

学者们对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传播带来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高危行为与易感性、致孤儿童问题、社区防治策略、社会工作者援助体系、家庭支持体系、学校健康教育等领域。

罗树杰博士在其专著^[11]中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校外青少年高危行为与易感性的探讨，认为易感原因主要包括腐败导致不良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太大；一些人利欲熏心，大肆制毒贩毒，组织卖淫；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存在缺失；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教育存在缺陷等。就如何保护校外青少年提出论文思考，包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艾滋病问题，在艾滋病的预防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痛下决心反腐败，抓好党风政风建设，为扭转社会风气树立榜样；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特点来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加强对高危行为人群进行干预，进一步完善打击卖淫嫖娼的法律、法规等。侯远高编著的《发展的代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伤害与艾滋病问题调研文集》中收录了杨平珏关于对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6个乡镇致孤儿童的分析报告，^[5]调查涉及全县孤儿1538人，占总人口的4.73%。报告对孤儿生存现状、受教育现状、健康状况进行统计梳理，并分析归纳出致孤原因。余晓燕博士的论文^[13]针对2003年之后，全国各艾滋病重度流行区域兴起了社区干预的高潮，各地干预的具体做法和社会后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以此为出发点，以云南省L县为个案，探讨地方性防治经验的体制成因与实践过程。试图说明，L县经验的成功之处在于防治重心的体制沉降恰好契合了本上的族群关系及信任文化，在此基础上，良善的医患关系实践最终将村医制度打造成了连接官方防治体制与本土道德世界的制度及文化桥梁。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就L县M村中的乡村医生Y在防治艾滋病过程中怎样连接国家与病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杨国才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应对》^[14]一书中收录了关于对云南省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家庭的作用、学校艾滋病健康教

育的效果评价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三、讨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试通过毒品传播与艾滋病、性传播与艾滋病、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艾滋病传播带来相关社会问题等四个方面,对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从梳理中可以看出,学人们对通过毒品和性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也为学科理论的应用研究开拓了新思路。但是,这还未达到社会科学对艾滋病问题研究应该有的视阈,许多研究方向和内容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对此提出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指教。

(一) 继续拓展研究个案,扩大研究地区和群体

以往研究关注点多集中在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区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市州,比如德宏、伊宁、凉山等。但是,随着艾滋病的流行,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已经分布在全国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加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客观上要求研究工作者须继续拓展研究个案,扩大研究地区和群体。一些艾滋病低流行地区如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省区,艾滋病的流行对上述地区少数民族的风险是怎样的,少数民族的高风险行为是什么,在防治艾滋病实践中遇到哪些问题等都需要学人们参与进来,给予研究和回答。除吸食毒品人群、从事商业性服务人群以外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男男同性恋群体的研究显然不够,包括群体的亚文化特征、群体内部结构、群体之间关系、男同主体性等还需加大研究力度。

(二) 关于宗教组织参与防艾实践研究欠缺

在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对宗教组织关注度不够,宗教组织参与防艾民族志研究还不多见。我国艾滋病流行的大部分区域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些民族地区又都全民信教,宗教力量在该地区防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点应该引起社会科学界的足够重视。比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寺院在参与艾滋病宣传预防实践的研究个案就比较欠缺。新疆新近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组织清真寺和宗教权威人士在艾滋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在多年防艾实践中通过宗教组织宣传预防艾滋病,但是,目前还未见到有对上述地区上述宗教组织典型的民族志研究,学术关注不够。

(三) 艾滋病所带来相关社会问题方面研究深度不够

艾滋病带来的影响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这是研究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中的次生问题,学界应同样给予高度关注。对此问题的研究应注意横向、纵向的比较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在产生若干社会问题对其影响的差异之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应用在产生若干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深度还未较好显现出来,这样使得研究成了程式化的对策建议研究,没有学科话语支撑,学术研究意味不足。观察产生的社会问题的立足点突出少数民族特征的研究不够,使得研究泛化。

(四) 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学科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单一及缺乏相关学科的整合,成为制约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中不容忽视的要素。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的研究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应用方向,有必要实现多学科的整合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既是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需要探讨的问题。因此,在研究此问题时,应当自觉地采用多学科的视角,既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也可以从人口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如果能做到这点,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深度、理论与现实意义就会彰显出来。学界应当在不断拓宽学术视野的前提下,尽量实现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在娴熟应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典型的研究个案。通过“以小见大”的研究个案,展现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目前少数民族相关艾滋病问题研究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 [1] 李冬莉. 社会转型与HIV高危行为：甘肃戒毒所的调查与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6.
- [2] 孙咏莉. 贫困、道德与焦虑：新疆萨阿代特社区中的艾滋病[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5.
- [3] 翁乃群，杜娟，金黎燕，侯红蕊. 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J]. 民族研究，2004，(6)：40-49.
- [4] 王晓丽. 寄生在同一个链条上的两害——乌鲁木齐市贩毒、吸毒人群与艾滋病人群的相关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2008，(4)：29-44.
- [5] 侯远高，丁娥. 发展的代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伤害与艾滋病问题调研[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7)：1.
- [6] 庄孔韶，孙庆忠. 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6.
- [7] 李飞，庄孔韶. “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3-60.
- [8] 高一飞. 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D].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6.
- [9] 卡马力提·库尔曼汗. 新疆乌鲁木齐少数民族同性恋族群认同分析[D].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
- [10] 傅果生. 失“神”的社区及其重建之道——瑞丽市帮养村景颇族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成因及其对策[D].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 [11] 罗树杰. 无声的危机：广西校外青少年高危行为与艾滋病易感性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9)：100-105.
- [12] 余晓燕. 区域差异视野下的艾滋病社区防治经验：云南L县之个案研究[J]. 社会，2010，(6)：221-241；余晓燕：HIV / AIDS防治中的医患交往艺术：一个景颇村寨中的信任表达[J]. 开放时代，2010，(3)：127-140.
- [13] 杨国才. 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应对[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

(责任编辑：小璐)

(责任校对：卢丽娟)
